

# 第七章

## 從當前台灣高等教育脈絡 論大學與產業界之關係

### 一、引言

本書第五章探討台灣的大學通識教育的歷程，第六章則從日本的教育改革經驗思考台灣的教育改革問題。本章進一步扣緊大學院校與產學界之關係；申論大學的主體性及其問題。我們先從相關行政法規切入。1995年1月23日「國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基金設置條例」開始實施，規定教育部在國立大學校院財務自籌比例達到20%的時候，可以依照預算程序之規定，在各大學設置校務基金，賦予各國立大學校院適度的財務自主權。依教育部規定，學校需自籌20%到23%左右的經費，其中學雜費約佔15%，剩下的8%自籌款項多半倚賴募款。據估計，校務基金制度實施後，所有國立大學每年需向全國個人或企業界募款共達四十億左右。這個制度實施之後，國內各大學莫不卯足全力向企業界校友募款，但努力有餘而成效不彰。1998年1月19日，在逢甲大學召開大學校院長會議，多位國立大學校長在會議中一致呼籲，終止試辦中的國立大學校務基金制。校長們認為，這項制度實施以來，困難重重、增加大學負擔，而且自籌款項也無法讓學校彈性使用，各國立大學既疲於奔命，

向產業界募款，但學校財務自主權卻未見提昇，因此紛紛批判教育部的政策。

這項爭端是當前台灣高等教育脈絡下，國立大學與教育部互相牴牾的諸多問題中的一項。這項爭議的表面所涉及的是國立大學校務基金制度、大學的財務自主權、大學募款制度等問題。但是，從深層結構來看，這項爭議實觸及高等教育發展中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大學與產業界之關係如何？**

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前夕，大學的性質與內涵隨著內部與外部因素的變化，而正經歷著巨大的變遷。從大學內部知識體系的複雜化來看，大學正逐漸從過去的 *university* 轉變成 *multiversity*，而學門多樣化、教授與學生數量的激增等數量，都帶動大學的性質逐漸改變。而這種知識科目與大學師生數量的擴張，也使大學從過去的菁英教育機構，逐漸越來越平民化。其影響所及，使大學與大學以外的各種領域（如社會領域、經濟領域、政治領域）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密化與複雜化。

在大學與大學以外各種領域關係變化的過程中，大學與產業界關係之緊密化與複雜化，為大學與產業界雙方都帶來新的問題。從大學的角度來講，大學如何從產業界獲取資源，而不失去大學作為知識社群的獨立自主性，這是大學與產業界互動時所應思考的重要問題。但是從產業界的立場來講，如何從大學獲得最新的科技與知識，以便有效促進產業的升級；如何將科技新知市場化，這是產業界與大學互動時最為關心的問題。

大學與產業界雙方不再能夠像過去一樣的各自獨立存在，隨著二十一世紀的來臨，雙方關係之日趨緊密（也就是所謂「產官學合作」），乃是未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方向。

本章扣緊當前台灣高等教育脈絡，論述大學與產業界的關係，爲了集中論述焦點，本文將針對以下三個問題，進行分析：

- a. 大學與產業界何以必然發生關係？
- b. 這種關係的基本性質有哪些？
- c. 在大學與產業界之間的複雜關係之下，雙方應如何自處並自我定位？

本章論述的展開，除第一節引言交代全文宗旨之外，第二節的主旨在於分析大學與產業界建立緊密關係之必然性，第三節則在第二節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大學與產業界關係之兩種性質：（一）兩者間的互相依賴性；（二）兩者間的內在矛盾性，並且論述由於這兩種性質而爲兩者之間以及大學內部創造不穩定性。本章第四節則扣緊第三個問題，論述在大學與產業界不穩定關係爲大學所提出的新挑戰，並探討因應這種挑戰的具體方法。本章第五節則綜合全文之論述，提出結論性的意見，呼籲現代大學師生一方面既要避免膨脹主體性的謬誤，但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喪失主體性的謬誤，大學師生必須深刻認識，大學與產業界之間存有既合作又緊張的複雜關係，並且以大學是學術社群自我勉勵，以便能夠在二十一世紀與產業界攜手並進，提昇高等教育的新境界。

## 二、大學與產業界緊密關係之必然性

大學與產業界之所以必然發生緊密的關係，可以從兩個層面思考：我們首先從普遍性的視野來看，第一個原因是大學無可避免是整體經濟領域的一部分，因為：

(a) 大學的存活與運作有賴於經濟資源的挹注。從二十世紀大學的發展史來看，大學獲取資源至少有兩種管道，第一個管道是來自於國家部門，如作為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的教育部、國防部、經濟部、環保署等單位常常是大學研究經費的重要提供者。大學既然從「國家」（state）獲取資源，因此大學無可避免地在某種程度上，發揮所謂國家意識形態機器（state ideological apparatus）的部分功能。從「國家」這個管道獲取資源之後，大學如何擺脫國家意志對大學教育的干擾，則構成大學必需面對的重要問題，「國家」常常透過教育政策的掌控、課程以及教科書的掌控，特別是國定必修科目教科書的掌控，將大學的知識社群性質轉化為國家意識型態機器之性質。除了從國家獲取資源之外。大學的存活與運作獲取資源的第二個管道則是來自於社會（society），大學可以從社會中的生產部門與服務部門獲取經濟來源，於是大學與產業界必須發展密切的合作關係，這是本文所探討的中心課題。大學從產業界獲取經濟資源之後，則不可避免地與經濟領域進一步整合，而使大學作為市場經濟，甚至是國家計劃經濟的一部門之性格日益彰顯。

(b) 大學的產品（畢業生）在離開校園之後，也大多數投

入經濟生產行列。大學不是營利事業，不是家族企業，更不是職業訓練中心，我們可以說：大學是運用社會或國家資源，但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實體。大學的存活與運作，不僅有賴於經濟部門與資源的挹注，而且大學的畢業生也投入生產與再生產的行列，這是大學與產業界緊密關係必然發生的第一個普遍理由。

大學與產業界緊密關係的第二個普遍理由，是植根於最近二十年來大學本身性質之逐漸改變。近二十年來由於產業結構的變化，特別是高科技的發展，帶動人類文明各方面的遽變，大學作為 *ideopolis* 的性質乃隨之日益彰顯。在大學校園內，人文社會科學由於與社會經濟部門關係日趨緊密，因此大學作為智庫 (*think tank*) 而對社會政治部門提供意識型態的服務，或是提供政治政策與社會政策的建議。大學中的自然科學部門則與科學園區 (*science park*) 緊密結合，在這種發展趨勢之下，大學逐漸成為所謂知識工業 (*knowledge industry*) 的工廠。尤有進者，最近二十年來，大學服務的對象，也有根本的變化。從世界大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中古時代大學服務的對象是傳教士，甚至到了十七世紀以後，如美國的長春藤盟校前身的 *Harvard College* (今日哈佛大學的前身)、*King's College* (今日哥倫比亞大學的前身) 等，莫不是以培養傳教人才為主要目的。十九世紀的大學則是以培養菁英領導階層為其目的。二十世紀以降，大學在相當大的程度之內是屬於中產階級的教育機構，為中產階級而存在。到了現在，由於民主化浪潮的衝擊，大學

之作爲全民大學的性格日益彰顯，在這種大學發展的新趨勢下，大學與產業界的關係必然日趨緊密。<sup>1</sup>

但是，再從特殊於台灣的具體情況來看，自從 1987 年 7 月戒嚴令廢除以後，所謂「民主化」的浪潮風起雲湧，席捲台灣地區各大學，在大學民主化的過程中，大學與社會的藩籬日益淡化，大學與社會經濟部門的互動日趨密切，台灣地區的各大學在最近這十年來，快速地邁向平民化，而成爲社會經濟建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並且也爲社會經濟的建制提供知識的服務。<sup>2</sup>我們可以說，最近十年來台灣地區的高等教育界與產業界關係之所以日趨緊密，實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在焉。

### 三、大學與產業界關係之性質

現在我們可以進而探討本章第一節所提出的第二問題：大學與產業界關係的基本性質如何？針對這個問題，我想在本節

---

<sup>1</sup> 關於大學的功能之變化，較早的通論性論著是：Clark Kerr,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關於 1960 年代以後美國的大學之變化，參考：Clark Kerr,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1960-198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Clark Kerr, *Troubled Times for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The 1990s and Beyon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sup>2</sup> 大學教育從菁英教育逐漸過渡到大眾教育，是近二十年來世界各國共同的趨勢。臺灣的教育經過前行政院教改會的改革之後，大學教育大致也以大眾化爲其方向，參考：李遠哲：〈大學理念與校長遴選〉，收入：黃俊傑編：《大學理念與校長遴選》（台北：通識教育學會，1997），頁 1-16。

的論述中指出，大學與產業界之關係具有（3:1）互相依賴性及（3:2）矛盾性這兩種性質，因此（3:3）而在產業界與大學之間，以及大學內部各部門之間創造不穩定性。接著我們依序論述這三個基本論點。

（3:1）互相依賴性：大學與產業界之間之具有互相依賴性，毋寧說是一個歷史的必然，也是結構的必然。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教育與文化發展的水準，與經濟的繁榮一直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可以以中國古代考試制度為例來觀察，統計資料顯示明代自從洪武 4 年（1371）至萬曆 44 年（1616），先後 245 年之間的狀元、榜眼、探花和會元，共計 244 人，其中南方出身者計 215 人，88%；北方出身者僅 29 人，只佔 12%。清乾隆元年（1736）詔舉博學鴻詞，先後選舉者 267 人；其中江蘇佔 78 人，浙江 68 人，江西 36 人，安徽 19 人，四省合計 201 人，高佔全部人數之 75%；而江蘇、浙江兩省獨佔 146 人，超過全國總額的半數。<sup>3</sup>從中國考試制度史所見的經驗，我們可以發現狀元、榜眼、探花和會元多出於經濟繁榮的江南地區。

另外一個具體例子是美國的經驗。大約 1960 年代以來，美國主要的大學大多分佈在兩個區域，一是從波士頓到華盛頓東部地帶。統計資料顯示，全美諾貝爾獎得主以及國家科學院院士有將近一半是居住在這個地區；第二個地區則是沿著加州海

---

<sup>3</sup> 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台北：木鐸出版社，1984），頁 21-22。

岸線展開的洛磯山脈地區。統計資料顯示，大約有 36% 諾貝爾獎得主，20% 國家科學院院士居住在這個地區，而這兩個東岸與西岸兩大精華地區，由於工業發展、人口集中，因此影響所及，人文薈萃，教育發達，名校林立。從以上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發現教育的發展與經濟的繁榮實有其深刻之相關性。<sup>4</sup>

不僅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大學的發展有賴於產業的發展與繁榮，而且從經濟生產的結構來看，兩者間的互相依賴性，也可以說植根於經濟結構的必然性之中。工業產能的提升、新產品的開發、高科技的發展等等，在在都有賴於大學及實驗室提供新的知識與技術。二次大戰以後，大學與科學園區的密切關係，乃是戰後世界史所見的一個普遍事實。就以台灣為例，新竹科學園區與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的緊密關係不言而喻，遠傳電訊公司更是直接得力於元智大學的支援。近二十年來，我國高科技發展，特別是半導體工業的飛躍成就，與大學的資訊部門在知識與技術上的支援實密不可分。誠如柯爾(Clark Kerr)所說，二十世紀的兩大變革在於「工業關係」(Industrial relations)和「高等教育」，而兩者的變化過程都可以用「趨同」(convergence)一詞來說明。所謂的「趨同」是指變得有些相似的過程，但並非指相同的結果。這是戰後世界歷史的一個趨向所在。就工業趨同這個現象來看，受工業本身、勞工、政府和消費者自主性的提昇的影響，工業已非獨斷的資本主義，而

---

<sup>4</sup> Clark Kerr,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chapter 3.



逐漸發展成多元的工業主義，由於多元的工業主義較能符合眾人的需求，所以各方面與工業的關係，也因而產生重大的變革。在高等教育的趨同而言，由於知識的普及，所需技術的相似，加上人的精神層面更加自由，所以各國的高等教育都面對相同的問題，並以相似的辦法解決問題，因而使得各國高教制度變得相似。再者，受工業化和民主化的影響，國與國之間高教的界線逐漸消失，教育朝向學習的統一世界前進。<sup>5</sup>而在工業與高等教育的趨同發展過程中，兩者更是互為因果。

(3:2) 矛盾性：但是，在大學與產業界互相依賴，共存共榮的表象之下，兩者間卻也潛藏巨大的矛盾性。這種矛盾性之所以不可避免，乃是由於大學作為教育領域其運作邏輯（modus operandi）在於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換言之，大學作為一個教育與文化機構，是以新知的開拓與文化理想的自我實現，為其存在之理由。文化的創造與新知的拓展是大學的目的，而不是它的手段。相對而言，產業界作為經濟領域，其運作邏輯卻在於獲利原則。換言之，從產業界的觀點來看，新知的開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產業界所關心的毋寧是新知識或新技術的市場價值（market value）。關於文化教育領域與經濟領域之間運作邏輯的不同、存在理由的不同，及其目的的差異所引發內在緊張性，70年代的社會學大師貝爾（Daniel Bell）已有深刻

---

<sup>5</sup> Clark Kerr, *Higher Education Cannot Escape History: Issu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pp. 1-2.

的分析，<sup>6</sup>我們在此不再贅及。

(3:3) 由於大學與產業界之間的互相依賴性以及矛盾性，所以大學與產業界之間不可避免地發展一種所謂的「敵對合作關係」(antagonistic cooperation)，這種合作關係為大學與產業界之間以及大學內部各知識部門之間，都創造了不穩定性(instability)。這種不穩定性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加以分析：

(a) 大學與產業界之間之所以存在不穩定性關係，主要是因為經濟部門在短期內所創造之利益，實遠大於教育部門所能創造的利益，因此經濟部門常常支配教育部門。從戰後台灣高等教育史的具體經驗觀之，在整體經濟政策的考量之下，從 1960 年代以降，從台灣高等教育部門的擴張與調整，常常是由經建部門從人力規劃的觀點進行規劃。羊憶蓉的研究指出，台灣地區的專科學校在民國 50 年代中期以後大量增加五專設立，60 年代初期以後又減緩成長；大學部門一直逐步擴張，又以工程、科技等科系成長較快，民國 60 年代增設工程及工技學院，70 年代以來研究所教育成長較快。這些教育特色，都可以從各期經建計劃和人力發展計劃中找出當時的政策用意與規劃目標。<sup>7</sup>我在這裡想要強調的是，臺灣的教育領域深深地受到經濟領域

---

<sup>6</sup>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sup>7</sup> 羊憶蓉：《教育與國家發展：臺灣經驗》(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4)，第二章，頁 35-72。

的支配，光復後數十年來，臺灣的教育政策基本上是建立在赫欽斯（Robert M. Hutchins）所批判的「直接需要說」或「社會改造說」的理論基礎之上，<sup>8</sup>要求教育為社會經濟部門服務。同時，流弊所及，即使備受重視的工程教育中，若干冷門的技術課程甚至也因為不能立即迎合市場需要，而有絕種之虞。<sup>9</sup>

（b）大學與產業界的合作關係，也在大學的各知識部門之間創造另一種不穩定性，由於受到經濟利益考量的滲透，所以大學內部學門之間的資源分配之競爭，乃逐漸脫離學術邏輯，以就業為導向的學院或系所逐漸在大學校園中取得支配性之地位，其結果則是大學的自我異化。

進一步言之，大學從產業界獲取資源以後，經濟資源的分配在校園中就構成一個難以妥協的問題，從若干公立大學的經驗來看。第一種較常見的分配資源的方式是一種平等主義的方法，這種平等主義主張大學應該符合校園民主的新潮流，大學經濟資源的分配應該符合校園民主的新潮流，由各系所平均分配。這種做法其實是一種偽平等主義，因為這種資源分配方式，未能重點支持學術研究卓越的系所，完全違背大學追求學術卓越為目標的基本性質。另外一種更常見資源分配方式，是循著

---

<sup>8</sup> 赫欽斯著、陸有銓譯：《民主社會中教育上的衝突》（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4），頁 23-40；41-56。

<sup>9</sup> 李家同：〈我國大學工程教育的檢討〉，收入：淡江大學教育研究中心、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編：《二十一世紀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體制、功能與學校組織》（台北：師大書苑，1990年4月）。

功利原則，也就是以各系所或學院募款數額之多寡，決定分配經濟資源之數額。這種分配資源之方式，基本上是由於大學受到產業界的滲透結果之一。這種分配方法之所以不可行，乃是因為這種方法實際上是一種「叢林法則」，因為戰後 50 年來，台灣高等教育的根本問題就在於功利主義的盛行，以就業為導向的學院或系所蓬勃發展，也因此當大學與產業界建立密切的互動關係以後，來自產業界的經濟資源常常挹注在就業導向的系所或學院之中。這樣功利主義的經濟資源分配原則，違背大學追求卓越的原則，因為大學是知識創造的中心，對少數的知識菁英應該特別加以鼓勵，大學更是知識革命的中心，因此大學的資源必須集中在學術領域上具有創新發展潛力或理論深度的學門，如此才能夠使大學的研究與教學更上層樓。

綜合本節的論述，我們可以說，大學與產業界的關係至為複雜，兩者間既互相依賴，又存有內在矛盾，這是一種共生（symbiosis）的關係，兩者合則兩美，離則兩傷。但是，這種關係卻也帶給大學相當的不穩定性，而如何從這種不穩定關係中，使兩者皆蒙其利、共存共榮，則是大學師生應該深刻思考的重要議題。

#### 四、不穩定關係下之問題及其對治之道

在上文論述的基礎上，我們再進一步扣緊台灣高等教育的脈絡，思考大學與產業界不穩定關係，為台灣高等教育所帶來

的問題及其因應之道。在這一節的論述中，我想提出兩點看法：  
（1）在當前台灣教育脈絡中，大學將逐漸受到經濟部門的宰制，因此非以就業為導向的人文學科及純科學的系所，將進一步受到忽視。（2）面對經濟部門對大學的宰制所造成的學術與教育結構的扭曲，大學因應之道在於勇於自我定位。我們接著闡釋以上這兩項論點：

（4:1）不穩定關係下大學教育結構的扭曲：最近五十年來，世界各地的大學與經濟部門建立緊密關係之後，也深受經濟部門的衝擊與宰制。以美國為例，最近二十多年來，由於美國經濟的成長趨於遲緩，失業率攀升，因此在美國各大學校園中大學生求學的功利主義心態，是有日趨明顯的趨勢。統計資料顯示：1969年至1976年之間，美國各大學中專攻職業科系的學生由38%躍升到58%。專攻人文科系者，則由9%降到5%。專攻社會學科者，由18%大幅降到8%。這種現象持續到1982年，專攻職業科系者，提升到64%。再以專攻領域來看，大一學生專攻歷史者，1973年占1.6%，1983年突降到0.5%；反觀專攻工學者，由6.6%急增到11%。<sup>10</sup>

其實不僅美國，臺灣的高等教育受到市場經濟的衝激與宰制，可能較之歐美的狀況有過之而無不及。從歷史的角度觀察，臺灣的教育史所呈現最突出的傾向之一，就是功利主義的濃

---

<sup>10</sup> *The Role and Functions of Universities: OECD Country Report,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1985, p. 96.*

厚。在明清時代台灣的教育，大體皆以參加科舉考試為目的，在 1887 年台灣建省以前，各種學校除了教導番民的社學之外，其餘多半是科舉的預備學校。如儒學諸生入國子監或應鄉試等。1887 年以後，劉銘傳出任首任巡撫兼理學政，成立西學堂（1887）、電報學堂（1890）、番學堂（1890），皆屬實務取向之教育。日據時代台灣高等教育特徵就在殖民主義與功利主義，而光復以後台灣高等教育發展則在相當大的幅度之內，是為了配合經濟政策。舉例言之，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在 1973 年的《第六期經濟建設計劃》中明白表示，台灣地區長期經濟發展計劃列有高級科技人力發展指標，將自 1970 年每萬人口中 31.5 人，增至 69 年之 63 人。在計劃期間（1973 年至 1976 年），除針對上述目標加強研究所及大學有關學科教學，以提高素質外，並採取下列措施：（1）依照科技人力指標，規劃理、工、農、醫四類招生名額，並提高與社會人文科系招生人數之比例為 55：54。<sup>11</sup>整體而言，戰後台灣高等教育之與經濟部門密切配合，固有其正面的貢獻，尤其是在於促進社會階層之流動，促使教育快速普及化等等，皆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由於過度配合各時期經濟政策之需求，卻使得高等教育的商品化性格日益強烈，而且由於國家力量以「人力規劃」之角度，強力介入教育體系，使教育之政治化性格也日趨濃烈，其流弊所及，則是使大學的工具性性格日益明顯。

---

<sup>11</sup> 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第六期經濟建設計劃》（台北：經合會，1973），頁 268。

(4:2) 面對以上不平衡關係所帶來的教育結構的扭曲，我們的出路在哪裡呢？我認為大學在與產業界的互動中，應該勇於自我定位，大學必須自我肯定，大學是學術領域與教育領域，不是經濟部門的婢女或產業界的附庸。具體言之，對治產業界對大學教育的滲透的要領，至少有以下三點：

(a) 大學必須堅持學術自由、自主與自尊：大學是一個知識的社群，大學為探索新知而存在，大學應為知識份子所管理，大學不應為大學以外的目標（如國防建設或產業升級）而存在。

(b) 大學教師應忠於大學而非企業：<sup>12</sup>大學固然從產業界獲得經濟資源，以從事新知之創造，但是大學教師是受僱於大學而從事新知的創造與傳播，並非受僱於企業，因此大學教師效忠的對象，應該是作為知識社群的大學，而不是作為經濟領域的產業。

(c) 大學與產業界的研究契約應受大學的監督，研究成果應公開出版流通：大學教師與產業界簽訂研究契約，進行新知的探索與創造。但是研究活動的進行與研究成果的流通都應受到知識界的監督，並且依據知識界的行規出版流通，而不是只提供研究成果給提供經費的企業者獨享。

---

<sup>12</sup> 這個問題在美國特別嚴重，也特別值得注意，柯爾就曾特別加以檢討，參考：Clark Kerr, *Troubled Times for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pp. 71-80.

## 五、結論

自從十九世紀末，北洋大學（1895）京師大學堂（1898）成立以來，近代中國的教育與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教育都呈現嚴重的斷裂。<sup>13</sup>本文所分析的大學與產業界之合作，也是源自近代西方而非源自傳統中國的新現象。這個新現象在近年來各方人士的推波助瀾之下，<sup>14</sup>逐漸蔚為臺灣高等教育的一項重要議題，值得我們加以注意。

綜合本章的論述與分析，我們可以提出一些結論性的看法。在邁向二十一世紀前夕台灣高等教育的脈絡中，大學與產業界的關係是複雜而緊密的，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隨著台灣高科技建設，以及臺灣與亞太地區經濟的日益緊密化，大學與台灣產業界的互動將日益頻繁。在這樣的特殊脈絡中，大學的師生應該：避免過度膨脹主體性的謬誤。大學不是遺世獨立羽化登仙的象牙之塔，大學是與社會攜手連心，共存共榮的知識部門。因此，大學不應過度膨脹主體性，而斬斷與大學以外的經濟、社會等部門之有機聯繫關係。但是大學也應避免喪失主體性的謬誤。大學與產業界關係緊密，不應該使大學喪失其主

---

<sup>13</sup> 參看：龔鵬程：〈高等教育與文化的關係：我國模式的探討〉，收入：淡江大學教育研究中心、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編：《二十一世紀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體制、功能與學校組織》（台北：師大書苑，1990年4月）。

<sup>14</sup> 參看：康自立：〈大學與產業界的合作〉，收入：黃政傑主編：《大學的決策與管理》（台北：英文書店，1997），頁149-166；《天下雜誌》，1997年度特刊（1997年11月15日出版）。



體性。相反地，大學應該深切認知大學與經濟領域之間，存有既合作又緊張之複雜關係。只有正面而深刻的體認這種複雜的互動關係，大學與產業界才能夠各自邁向健康的發展。而就大學來講，大學是學術的社群，不是一個營利事業，這項認知是使大學主體性適度發展的重要前提。(1998年5月)